



六十支蜡烛

苏联文学译丛



重 庆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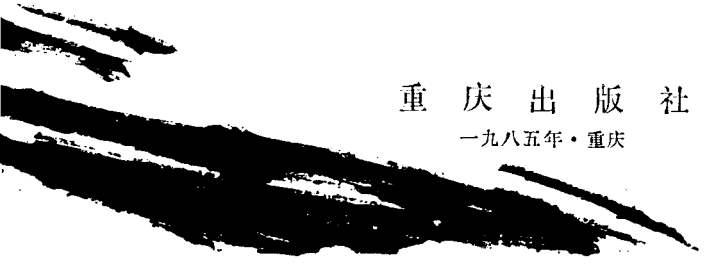
六十支蜡烛

作者：〔苏〕田德里亚科夫

译者：~~钱 诚~~ 吴新生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封面设计：吴时敏

六十支蜡烛

钱诚、吴新生译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75 插页：2 字数：130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5,300

书号：10114·199

定价：0.85元

田德里亚科夫及其《六十支蜡烛》 (代序)

—

弗拉基米尔·费多罗维奇·田德里亚科夫是我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苏联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也同在苏联一样曾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不幸的是，正当广大读者还在期望着这位炉火纯青的艺术大师以其新的创作对文学事业作出更多建树的时候，他竟溘然长逝了，享年仅六十一岁。1984年8月7日和8日苏联《真理报》和《文学报》相继发表由知名作家和社会人士三十余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的讣告，认为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事业”的共产党员作家的逝世是“苏联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的广大苏联文学爱好者对作家的弃世也必然感到同样的沉痛。这里扼要介绍一下作者的生平及创作，以

聊寄哀思。

弗·田德里亚科夫1923年12月5日生于沃洛格达州的马卡罗夫斯卡亚村(现维尔霍伐日区)。他的祖辈是勤劳朴实的农民，为人诚实敦厚，颇受乡里爱戴。由于他家的姓较为拗口，乡亲们便用一个顺口的绰号“科吉克”亲昵地称呼他们一家，并把他家开垦的一片山岗叫做“科吉克山”。这个地名一直沿用到现在。作家的父亲费多尔当年在农村当一名小公务员，叔父安德烈在十月革命后农村尖锐的斗争中惨遭富农杀害。1923年是革命的俄罗斯刚刚结束严峻的军事共产主义而转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经济困难，社会混乱，生活在僻远落后的农村中的田德里亚科夫的童年的境况是不难想象的。后来，随着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生产的逐步恢复，作家总算平安地读完了小学和中学。但是，1941年6月希特勒向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人民奋起保卫祖国。不满十八岁、刚刚走出中学大门的田德里亚科夫便同千百万苏联青年一样拿起枪来，奔赴前线了。作为一名步兵部队的无线电通讯兵，他在战壕里经历了侵略者疯狂进攻、苏联红军步步后退的极其严酷的战斗第一阶段。他亲身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斯大林格勒(1961年改名为伏尔加格勒)保卫战。1943

年，他在解放哈尔科夫市的战斗中负重伤，伤愈后复员到基洛夫州的一所农村中学任军事课教员，不久又被调任共青团区委书记。1945年秋，他为了实现当画家的多年愿望考入全苏国立电影学院艺术系。但一年之后他认为在这方面自己是“志大才疏”，便又考入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1948年他参加苏联共产党，1951年由高尔基文学院毕业。他曾担任《星火》杂志通讯员、记者、编辑，后来专门从事创作，并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进入恢复和建设的新时期。这时，农业经济中原已存在的严重问题日益暴露，农村生活中矛盾重重。但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仍然把农村描绘成一片歌舞升平、喜庆丰收的景象。文学中的“无冲突论”倾向虽然在1952年已受到批判，虽然老作家奥维奇金已经在1952年发表了揭露农村生活中的矛盾的小说《区里的日常生活》，在斯大林逝世后又接着发表了同一题材的《在前沿》，但许多作家仍然由于“不容易掌握歌颂与粉饰，批评与抹黑之间的界限”^①，对这一领域望而却步。正是在

① 尤·拉普捷夫：《跟上时代的步伐》。

这种气氛中，1953年底田德里亚科夫在《新世界》上发表了描写一个农庄主席的蜕化变质过程的中篇小说《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作品对“至今几乎是沉默不语的，或者是按照理想化农民的模式被装点起来的”^①战后苏联农村生活作了比较真实的描绘，以其敢于正视矛盾，敢于干预生活的勇敢精神和朴素、率直、真实的艺术风格在苏联评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虽然这反响是由两种不同的声音——称赞和批评所组成，但那强烈的程度本身已足以说明作品所受到的重视了。一位刚满三十岁的青年作家以生气勃勃的姿态登上了苏联文坛。

田德里亚科夫最早的作品发表于1947年。青少年时代的农村生活和战争经历既充实了他的内心世界，也帮助他积累了生活素材。因此，还在文学院学习期间他便开始发表了一些关于农村和战士生活的特写，《我们排里的事》（1947）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篇。1951年他出席了第二次全苏青年作家代表会议。

继《伊凡·楚普罗夫的堕落》之后，翌年作家又发表了同类题材的《阴雨天》和《不称心的女婿》。1956年他的短篇《路上的坑洼》和中篇《死结》（最

① 叶·西多罗夫：《田德里亚科夫选集》（四卷本）序言。

初名《萨沙动身了》)问世，使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一时曾被人们称为“揭露型作家”。

田德里亚科夫不断地开拓新的题材。1958年他发表《神灵显圣》，抨击当时正有所抬头的宗教迷信活动。1959年发表以青少年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在飞逝的一天之后》(或译《跟着飞跑的日子》)，提出了有关教育思想、教学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家庭教育、社会影响等多方面的问题，引起一场热烈的讨论，打破了教育界的平静。进入六十年代后作家又相继发表《三点、七点、爱司》(1960)、《审判》(1961)、《短路》(1962)、《蜉蝣命短》(1965)等探索社会道德问题的作品，展示了社会生活中尖锐的道德冲突，成为这一题材领域的有力开拓者。其中《审判》一书曾引起有七家文学报刊参加的争论。^①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涵义深刻，提出了尖锐的道德问题，“文学的任务就是要用这部作品所提示的那种道德精神来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良心”；有人则谴责作品的基调“不对头”，说它表现了作者本人“对官方人士、法律和国家的立场”。

① 就《审判》发表评论文章的报刊有：《文学报》、《消息报》、《文学与生活报》、《十月》、《涅瓦》、《文学问题》、《哲学问题》。

从七十年代开始，田德里亚科夫又转向青少年教育题材，相继发表了四部中篇：《变幻莫测的春天》^①（1973）、《毕业典礼后的一夜》（1974）、《惩罚》（1979）和《六十支蜡烛》（1980）。这四部作品都曾在读者中引起讨论，最后一部尤其受到注意，它仿佛集中地表现了作家对教育问题的种种思虑。^②

弗·田德里亚科夫创作的特点之一，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他说，“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只能是从他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出发的……如果艺术家无视他所处的时代，不能把握时代的利益所在，不能反映时代的利益，那么，子孙后代就必然会对他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将无法根据他的作品对过去的时代作出如实的判断。”^③在这位有胆有识的作家看来，“文学的任务……是描绘正面事物与反面事物之间的斗争，是描写新生与衰亡之间、新与旧之间的斗争”。^④他就是遵循这一原则进行创作的。

① 或译《春潮翻腾》、《青春多变》，中译本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关于这四部作品的分析，请看拙文《教育领域中的探索——评田德里亚科夫的教育题材小说》。（载于《苏联文学论集》，1982年版，作者署名钱裕民。）

③ 田德里亚科夫：《比事实本身更加真实》，发表于1984年8月8日苏联《文学报》。

④ 田德里亚科夫：《批评在生活和文学中的作用》。

在艺术手法上，作者喜欢把作品的情节推向极端和绝境，使它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生活中有代表性的东西加以夸大，使它达到具有绝对性的程度。”^①他喜欢把人物置于非同寻常的环境中，置于进退两难的严重考验和道德选择面前，放到无法解脱的“死结”之中，指出尖锐的思想道德冲突，把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但是，无论写什么题材，作家都只是强调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对于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他有时只是诉诸人物本身的“良心审判”。这种“审判”自然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作家本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别无办法。因此，许多思想，许多显然不会得到承认，而又显然是作者认为反映着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思想，他往往不得不放到作品中次要人物的口中，让这些人物仿佛是在无意中流露出来。这可能就是某些读者认为“作者的态度不够鲜明”的原因所在吧。作者生前最后一次会见记者时曾颇有感慨地引用了一位女教师给他的信，信中谈到许多读者对小说《惩罚》中一段关于“生活几何学”的谈话的热烈反应。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是这样说的：“在生活几何学中曲线永远比直线短！……我只有一个愿望，

① 田德里亚科夫：《比事实本身更加真实》，发表于1984年8月8日苏联《文学报》。

就是让我的女儿幸福，我希望她能适应环境，希望她懂得，生活中会遇到险峻的高山和无底的深渊，直着走是过不去的，要经常绕着弯儿走。如果能够做个正直的人，就做；做不到时就得机灵些；别象自己的父亲似的一个劲儿地朝前闯，碰得头破血流。我要让她懂得，切切实实地懂得，不可能使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善良可亲，也别指望人家会对你多么善良和亲近。我要叫她别去碰那些能够毫不费力地打断她的脊梁骨的强者，而要时刻小心谨慎，学会在迫不得已时低下头来。我希望她别成为一个天真的傻姑娘。”女教师在给作家的信中提到她组织的作品讨论会时说，许多读者不但没有谴责这段话，相反，对此表示了完全赞赏，认为“这个汉子说得对！真给他说到‘点子’上了。”作家本人对此没有“表态”，他是在谈到每个读者都会按照各自的方式、根据自己的认识理解作品时提及这封信的。

弗·田德里亚科夫的创作道路曾经对六十年代的青年作家产生过很大影响。有的评论家（如叶·西多罗夫）认为苏联文坛上的一些后起之秀，如瓦·舒克申、瓦·别洛夫、费·阿勃拉莫夫、勃·莫札耶夫等，都是沿着田德里亚科夫的道路前进的。

弗·田德里亚科夫的不少作品已被介绍到国

外。他被日本和西方的某些苏联文学研究家们^①看作“自由派”作家（与所谓“保守派”作家相区别），或者被说成是“复兴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相区别）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国外也受到相当的重视。

二

《六十支蜡烛》是作者最后的，也是最能反映他晚期思想的作品。作者最关心的是教育问题。他说：“我所珍视的不是教师这种职业本身，我最为珍视的是未来的生活，是我们的下一代。要知道，忽视了学校教育，就根本无法谈什么未来。”他十分关心“我们今天的中学生在十年或十五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②

本书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老教师叶切文刚刚隆重庆祝过六十寿辰，正在他志得意满，以为此生虽未飞黄腾达，却也并未虚度时，他收到一封“从前的学生”的来信。信中指责他毒害学生，说他是“多年来的社会传染病疫源地”，并且

① 如：日本的江川卓，英国的杰弗里·霍斯金，美国的戴明·布朗。

② 见1984年8月8日苏联《文学报》。

声言决心杀死他……霎时间这位被誉为“教育界的智慧和良心”的老教师竟变成了“社会传染病疫源地”！叶切文在死亡威胁面前回顾自己四十年的教育生涯，走上了良心审判的法庭^①……

作者没有向我们展示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而只是通过主人公的追忆和自我剖析引导我们一步步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透过叶切文，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部分知识分子对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的沉痛反省，看到他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所感到的苦闷和彷徨。

……谁会对我这么恨？为什么要杀死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叶切文不得不翻翻良心上的旧帐。这时他意外地发现自己身上许多过去并未意识到的东西，他的为人对自己来说也还是个“未知地域”。他首先对自己的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异己的？“我是个教员，如果我自己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还怎么去教别人？怎么教？教什么？”

在此之前，叶切文一直相信自己对学生讲的都是“真理”，会引导学生走向美好的未来。现在他

① 以下关于作品的分析基本是拙文《良心的审判》的内容，略有删改。（该文载于《苏联文学》1981年第3期，发表时署名裕民。）

动摇了：我传授的究竟是真理还是从别人那里搬来的现成公式？是啊，他曾坚信过“包括伊凡雷帝在内的所有沙皇都是吸血鬼”，坚信过遗传学中的孟德尔定律是“伪科学”，他曾认为与这些“我们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都是“异己的”。后来，教学大纲里说“沙皇伊凡雷帝具有进步性”了，报刊上承认孟德尔定律是“真正的科学”了，于是他又跟着转过来，坚信这些是“我们的观点”，并要求学生照此背诵。叶切文的信仰不是来自生活，不是基于认识，他只是接受现成公式，而一旦现成公式有所变化，他便不能不感到茫然。现在他说不清究竟哪一种观点是“我们的”或“异己的”了。他此时已经认识到全优学生列娜只不过是“一只认真的鹦鹉，只善于背诵、学舌”。其实，反躬自问，他自己当年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今天，当从前的学生要对他下毒手的时候，他惊呼：“如果学生要起来砸碎自己老师的脑袋，人类就将无法继续生存了！”今天，当列娜在课堂上重复他教过的话时，他却对她谈论杀人时的那种轻松语气感到震惊了。但是，四十年前他自己不是曾经要求过心爱的姑娘塔尼娅坚决抛弃她的亲生父亲吗？这些年来他这位教师不是只教会学生们鹦鹉学舌而没有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吗？叶切文深深意识到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而当他进

一步想到列娜这样的“连只小老鼠都不会杀死”的学生一旦“需要”也会赞成杀人的时候，他被万千的联想搅得心慌意乱了。作者通过主人公的反省尖锐地提出了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偏重技术知识传授而忽略道德品质培养的问题。而这正是把人培养成共产主义社会的自觉建设者还是冷漠无情的“机器”^①的重大问题，它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而具有广泛得多的社会意义。

反省自己一生的为人，叶切文仍然认为自己不是个阿谀逢迎的小人，也不是野心家，而是把大部分生命献给了艰苦的工作的“诚实的人”，“自己并没有为自己活着”。但是今天他觉得自己身上除此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他决心从不同的角度、从“背面”观察一下自己。

使他受到最大震动的是亲生女儿薇拉的话：“爸爸，您是既牺牲别人，也牺牲自己。您对谁都不善，甚至对自己也不。”女儿甚至把他比做“为了祭祀自己的神而去杀人……藉以取悦于神”的古代多神教教徒。这些话迫使他追忆往事，迫使他认真地剖析自己的“诚实”、“好心”和“爱”。他诚实吗？那难道不是列杰涅夫说的那种随着新命令的下达而即刻改变态度的“遵命诚实”？他过去的

① 《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

所作所为难道不是随波逐流？他的所谓观点和认识难道不都是人云亦云？他为了自己站稳“立场”而逼得恩师走上绝路，为了自己显得“革命”而把心爱的姑娘“扔进了波涛”，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而弃绝了亲生女儿……这一切该怎么解释？“你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辩护一下看看！”当年他曾经“好心帮助”过一个（岂止一个！）学生同父亲划清界限，而今天他亲眼看到了二十年前他那种“好心帮助”造成的结果。面对着凶手，他怎么能不感到这既是“活生生的教训”，又是“可怕的控诉”呢？自己确实有“背面”，而且这一面远不如“正面”那么美好。那么，从历史的高度看，哪一面该算正面呢？……

叶切文似乎恍然“觉今是而昨非”了。可是，他究竟错在哪里呢？要知道，连决心杀死他的凶手都承认他“不是个卑鄙小人”啊。为什么他会突然精神崩溃以至于决心自裁，把枪口对准自己？为什么他“希望做个有益的人，却总是给别人造成不幸”？叶切文的悲剧何在？这正是作品着重探索的问题。作者通过对主观和客观原因的深入剖析，使我们看到了他的悲剧的社会意义。

起初，叶切文曾企图把原因归结为苏柯夫当年对他的引导：“苏柯夫把我纳入了一条轨道，我沿着这条轨道行驶了四十年。”乍看起来，这

话不无道理。虔诚的革命者苏柯夫确实曾把阶级斗争庸俗化、简单化，做了许多蠢事。叶切文在当时流行的思潮影响下违背良心的呼声，干了些既害人又害己的事，后来思想渐渐僵化并以此去影响学生，这里的社会历史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如今叶切文终于认识到“过于简单的逻辑往往害人不浅”，他痛心疾首、悔恨交加，这心情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每个人的人生之路毕竟是自己走过来的，凡事还得反求诸己。既然塔尼娅和克罗波托夫（虽然表现方式截然不同）都没有被纳入苏柯夫的轨道，就说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每个人的内因。叶切文的父亲是个没有文化的鞋匠，送葬行列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村劳动者，但他们都没有成为“简单逻辑”的俘虏。父亲送葬回来后把叶切文狠狠地打了一顿，骂他是条蛇，这在当时也似乎没有使叶切文感到意外，所以他才默默地忍受了……自我剖析的利刃一层层深入，叶切文终于吃惊地、厌恶地看到了自己的“私心”，看到了那个随波逐流、总想在狭隘的小天地中苟且偷安的“自我”。每当他处于生活的岔路口上时，正是这颗私心把他推向“最轻松的路”的。他遇事总是“避难就易”，总是选择“最轻松的路”走，正是（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真诚地认识到了自己与克罗波托夫其实是“难兄难